



忠義水滸論

余大平 著



湖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丛书之三

余大平 著

忠義水滸論

陝西旅游出版社

(陕)新登字012号

忠义水浒论

余太平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32号 邮政编码710061)

新华书店经销 九江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6.6印张 165千字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418—0682—X/I·213

定价：4.00元

序

大约在四百年前，我国十六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文学批评家李卓吾，曾为当时流行的100回本《忠义水浒传》写过一篇有名的序文。四百年后，湖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湖北省《水浒》学会秘书长余大平同完成了他撰写的《忠义水滸论》一书，请我为此书作序。我十分高兴地，但又感到有些为难地应允了他的委托。我对大平同志的委托之所以非常高兴，是因为《水滸》这部名著，尽管在“文革”中遭了浩劫，但进入80年代，它的地位已不断提高。湖北省的古典文学教师，在1981年就发起组成了全国第一个研究《水滸》的学术团体——湖北省《水滸》研究会。而且举办了首届全国《水滸》学术讨论会。为了提倡百家争鸣，又在全国《水滸》研究家的关怀和支持下，创办了《水滸争鸣》丛刊。这可以说是得风气之先。它也迫切地期待有大批的中青年研究工作者脱颖而出，承担继往开来的重任。大平同志在大学时期就沉潜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80年代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之后，也就自觉地成为了《水滸》学术活动的积极分子，并且在他为推进学会的工作作奉献的同时，致力于《水滸》研究。这本《忠义水滸论》就是他近几年研究《水滸》所取得的成果。我认为，《忠义水滸论》这本书不仅命题有新意，而且是通过新的视角研究《水滸》，提出了不少的新见解。最近在开封市——

古宋都举行的第六届全国《水浒》讨论会开幕式上，我受中国《水浒》学会理事会委托致词，我讲的题目是《在当前加快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搞好搞活跨世纪的〈水浒〉研究》，提出要把继续开展争鸣，支持有价值的研究论著的出版作为繁荣《水浒》研究的有效途径。而这本《忠义水浒论》正是适应当前的需要之作。它的问世，显然会受到研究同行的瞩目和读者的欢迎。这是我乐于为它写序的原因。

那为什么我又感到为难呢？这是因为研究《水浒》不同于研究其它的古典小说，《水浒》自身有它的特殊复杂性。只要一涉及它的创作者是谁？是罗贯中还是施耐庵？还是二人合著，或是合作继续？或是无名氏托他们之名所作？它究竟是什么时代撰写成书的？最早的《水浒》究竟是繁本还是简本？它和现今流传的《水浒传》之处在哪里？等等问题，就会令人头昏脑胀，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

除了关于作者、成书时代和版本源流等问题以外，还有一个更令人棘手的问题：那就是这部小说的主题是什么？究竟是农民起义斗争的教科书，还是它的腐蚀剂？1975年以前人们习惯于称《水浒》是农民起义斗争的课本，尊崇无所不至，殊非《红楼梦》所能企及。而在1975年开展评《水浒》以后的一段时间，《水浒》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竟一落千丈，甚至到了人人得以斥之为反面教材的程度。而70年代以来，人们对于《水浒》的认识则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说好说坏，或赞或骂，每一个研究者都有其自由。至今称它为反面教材的有之，称它为革命课本的有之，仍然视它为写农民起义题材的有之，而任意把它当作反权奸斗争的，或反贪官污吏的，或写绿林豪侠生活的，或写市民阶层小说的，也所在多有。真是纷纷扬扬，莫衷一是。至于对《水浒》的评点家如李卓吾、叶昼、金圣叹的评价，更是说不清判不准的一大公案。可以想见：一个研究者要全面回答这些彼此矛盾的、

有时简直是如冰炭不能相容的问题，该多么困难。况且即使能够一一作了答案，也很难说服每个读者。因为我们的脑子里早已装满了不同于任何作者的一套概念，这岂不是写了等于没有写么？有人说《水浒》是一部小说，我们应该着重研究它的艺术性，少谈些政治问题。因为政治问题十分敏感，它不能不经常地发生变化，这样会出现“今是而昨非”，否定——否定——再否定的现象云云。但是，我们研究《水浒》能抛弃任何政治因素仅仅谈它的艺术性么？只要承认知人论世的原则，就会承认离开了作家生平、作品时代、版本源流、主题思想的研究，而仅仅去研究《水浒》的艺术性是行不通的。可见，由于《水浒》本身的复杂性，它与政治的关系特别紧密性，加上由于“文革”的浩劫，在全国范围内对它大肆蹂躏，使之遍身蒙上污垢之后，要想为它恢复名誉，使之重新登上农民起义斗争教科书的受奖台，是很不容易的。这也可见要想写一本全面论述《水浒》的著述是多么困难。本来为学术著作写序就是一件难事，而为《水浒》论著写序尤其不易。因为《水浒》现在还是一团浑水、一场混战之中，它并没有一套判断各人是非的程式，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看法。写序的人和书的作者意见不能统一，这是不可避免的。写序的人如果对作者与自己相同的意见大加赞美，这是阿其所好；如果对不同意见加以非议，这是强人从己；如果沉默不言，那是对读者不负责任。这就是我对此序难以着笔的原因。

但是转而一想，这些困难固然是客观存在，然而只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有些困难问题未必不会迎刃而解。所谓主观能动性，就是要做到“修辞立其诚”，亦即有啥说啥。经过深思熟虑，认为作者的见解确是深刻的，就不妨热情地加以赞美；对于作者的意图表达得不够明显的问题，则可以进一步地探索，以帮助读者作深入的理解；对于某些应该涉及而未明确提到的论据，则可以作些补充；至于对作者某些值得商榷的提法，也应该让作者反思，

供读者择善而从。

我想这篇序就按上述原则来写，也许是能得到作者和读者首肯的吧。

首先说说“命题新”的问题。本书命题为《忠义水浒论》，表面上和李卓吾的《忠义水浒传·序》近似，而实则迥然不同。正如作者所说，李卓吾本人就有很浓厚的忠义思想，其《忠义水浒传·序》可以说是他忠义思想的宣言。作者认为袁刊本中的“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云云，正是李卓吾的肺腑之言。可以说，李卓吾的序文，既是为了对水浒人物的忠义思想的承认与评赞，也是对鼓吹这种忠义思想的小说作者的赞扬。其目的在于维护封建制度的长治久安。而《忠义水浒论》则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来探索《水浒》的忠义思想在中国是怎样产生的，它是怎样通过各种方式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在广大人民的思想深处扎下根来，并经历几百年的加工成为广泛流行的水浒故事的指导思想，最后，小说的作者又把它作为《水浒》的主要线索贯穿全书，使之成为小说的思想主干之一。李卓吾在《序》中歌颂的不仅是有忠有义的108人，他尤其极口称道“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即不惜作赵宋王朝殉葬品的宋江为“忠义之烈者”，也就是忠义的最崇高、最完美、最深刻的典型。而本书作者则强调忠义思想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作者仍严肃地指出这种忠义思想“不能完全掩盖……投降、失败的历史悲剧的血腥气息”，而且强调“从整体上看”，忠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这部“英雄传奇小说的起义造反主题”。这可以说是对鼓吹忠义思想的李卓吾等人的严厉批评。而这也就是本书和李卓吾的《序》的分野。

第二，本书的另一优点是作者能够从新的角度看问题。一般的研究者习惯地把“忠”仅仅看作是对封建朝廷效其愚忠，而义

则不过是江湖义气而已；所谓《忠义水浒传》，顾名思义，无非宣扬投降主义“光荣”而已。但本书的作者却能从大处着眼，可以说是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待忠义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它在封建社会的特殊功能。“忠义”两字作为一个名词似乎永远没有变，但其实，由于时代、社会环境的变迁和不同的人其立场、观点、文化素质存在差异而在对“忠义”的解释方面，有的偏重于从保守的立场来解释，有的则能用革新的观点来解释。这样，同一“忠义”口号，也同时具有农民起义的腐蚀剂和农民反抗斗争的护身符的双重作用。通常人们只看到统治者利用“忠义”来维护其反动统治这一方面，而本书作者却着重论述“忠义”如何成为开展起义斗争的群众的一面旗帜，利用这一“合法”的口号来推动谋求自身解放的事业。也正是由于本书多角度、多层次地论述了忠义思想、忠义口号的正面与反面的作用，也就启发了读者对待复杂的文学作品不应简单化、绝对化。

第三，本书最难写的是关于金圣叹评《水浒》这一章，但是我认为本书写得最好、分析得最细致的也正是这一章。不知道是有幸还是不幸，笔者卷入为金圣叹“打官司”的活动已有多年，我不讳言自己对金圣叹是很同情很偏爱的。我认为《水浒》研究的最大难点不在小说本身，而在如何给金圣叹改评《水浒》的动机、改评后《水浒》的思想、艺术价值、社会效果以应有的高度评价，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一向是把为金圣叹翻案看作是翻《水浒》之案（指对历来对《水浒》的一切错误看法的矫正）的前提。金圣叹确实不愧称为大思想家、中国小说理论的高峰和《水浒》最后的定稿人。因此，金圣叹的评价问题和《水浒》的问题实际属于同一系统。说来也怪，对这样的认识在古代文论、文学批评史和美学史界大体已有共鸣，然而小说史界诋斥金圣叹的观念颇不易改变。特别是如果提到金圣叹同情张献忠、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真批改本《水浒》中的“惊噩梦”和一些否定

起义造反，攻击宋江不忠不孝不义的言论实际上乃是为了传书而不得不给作品涂上的保护色的看法时，现在虽不象60年代那样受到猛热的抨击，但仍有一些人不以为然。而使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本书的作者对“保护色”这一提法进行了专题的、细致的研究。他探讨了金圣叹在农民起义高潮中“削忠义而存水浒”的深刻用心，对金本《水浒》产生的鼓舞起义斗争的效果作了客观的分析，读后令人击节叹赏。将这一章和第8章对照起来看，尤其可见作者善于运用辩证法来分析问题、评价人物。作者把金圣叹和李卓吾对比着写，既没有否定李卓吾作为前驱者的贡献，又突出了金圣叹的高峰地位。这使我们看到，今后研究《水浒》者不仅不可能再对金圣叹肆意丑诋，即使要想采用不提金圣叹一字，从而把他排斥在《水浒》研究的视野之外的做法，也不会有多少支持着了。

在这里，我还想附带地讲讲中国《水浒》学会的宗旨，是既要研究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也要研究《水浒》评论家李卓吾、金圣叹等人的文学理论遗产，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发扬爱国主义传统。而正是由于我们提倡把对《水浒》本身的探讨和《水浒》评论家李卓吾、金圣叹的评价问题当作一个系统来研究，因此，我会同仁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不仅大大丰富了中国小说史的内容，而且拓展了它的领域，改变了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面貌。我认为大平同志此书也可以说是我们《水浒》研究学界在80年代至90年代之交作出的成绩之一例。

此外，本书在阐述《宣和遗事》的民族意识、评价元、明水浒杂剧和论述两本《水浒》续书方面，也时有新意。此书将“忠义”的问题作为主线贯穿下来，使全书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这在结构上也是颇费经营的。

当然，可以想象得到，有的读者也许会对本书在考证方面着墨不多感到不足，但这不是一个功力问题，而是一个体例问题。

本书着重在探索评述浸透在《水浒》一书中的忠义思想，且篇幅有限，因而避免多涉及《水浒》作者与作品产生的时代以及各种版本等等问题，以免枝蔓。这也未尝不是一个特点。

写到这里，使我想到目前全国性的《水浒》讨论会已开了六届，但是对许多问题看法的分歧依然存在，而且这些问题有越来越复杂的趋势。但应该看到，这正是《水浒》魅力之所在。它象是一片汪洋大海，而不是一方池塘。因此，我们对《水浒》的研究决不能浅尝辄止，否则就会见笑大方！愿以此与作者和有志于献身《水浒》研究的同仁共勉。

张国光 1992年10月

（张国光：中国《水浒》学会执行副会长、湖北省《水浒》学会会长、湖北大学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所所长、湖北大学中文系教授。）

目 录

序 张国光

卷首语 (1)

上编 创作论 (9)

第 1 章 水浒忠义思想寻源
——宋江起义史实的再梳理 (11)

第 2 章 来自民间街谈巷语的消息
——几则宋元诗文材料新探 (20)

第 3 章 历史悲剧与时代精神
——宋元话本中的水浒故事 (29)

第 4 章 特殊时代的特殊表达方式
——关于元人水浒杂剧 (53)

第 5 章 《水浒传》成书前的历史阵痛
——关于明初水浒文学的“沉寂” (72)

下编 作品论 (94)

第6章 《水浒传》流传后世的奥秘

——造反故事的魅力与忠义思想的掩护之功

..... (98)

第7章 梁山的成败与忠义思想的功过

——宋江是忠义思想的化身 (121)

第8章 李贽的攻击之矛与掩护之盾

——第一次对《水浒传》忠义思想的肯定

..... (142)

第9章 金圣叹的“断尾巴蜻蜓”

——第一次对《水浒传》忠义思想的否定

..... (161)

第10章 历史的重复与重复历史

——《水浒传》的续书对忠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 (188)

卷首语

大约成书于明代中叶的《水浒传》①，它的成书过程，作者以及这部小说本身所提出的许多问题，至今仍象谜一样地使人捉摸不定。从它问世之日起，就有许多文人学者研究它，一直讼说纷纭，新见迭出，直至今天仍在热烈地“争鸣”。在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里，有许多人可能不知道我们赖以生存的大地原是一个球体，可是无论贫富、智愚、善恶，没有人不知道《水浒传》这部书和它的人物与故事的。人们看小说，首先是为了消遣，为了娱乐，“受教育”是在娱乐过程中，亦即审美过程中自然发生的事情。在阅读同一部文学作品时，不同的读者，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思想状况不同，因而他们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思想内容和艺术气韵等的理解与把握也是各不相同的。这就是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这种现象，鲁迅先生曾针对《红楼梦》的问题说过一段很著名的话：“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②对于《水浒传》这部古典小说来说，这种审美过程中产生的歧异更是明显，尤其是在对它的思想内容的理解方面，这种歧异甚至达到了完相反、尖锐对立的程度。

从《水浒传》问世直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这近四百年的时间里，对这部古典小说的思想内容的认识主要是两种观点，一是“忠义”说，一是“强盗”说。就人数而言，持“忠义”说的人占大多数。他们憎恶小说中所描写的那一群贪官奸贼，同情一百单八人被“逼”上梁山的遭遇，理解宋江等人的造反行为，认为宋江等人是“忠义”的化身，并对梁山的悲惨结局掬以同情之泪。在这些读者中，主要是一些正直的中下层文人学子和市井小民，但是也不乏统治阶层中的人物。持“强盗”说的人是少数。主要是上层统治者和一些“身处江湖而心怀廊庙”的中下层人物。

“忠义”说和“强盗”说是两个水火不容、完全对立的看法。力主“强盗”说的俞万春把这个问题点得很透彻，他在《〈荡寇志〉引言》中说：“杀人放火也叫忠义，打家劫舍也叫忠义，戕官拒捕、攻城陷邑也叫忠义。看官你想，这唤做什么说话！”

“总而言之，既是忠义，必不做强盗；既是强盗，必不算忠义。”

从五十年代起，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人民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许许多多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开始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研究学术领域里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古典小说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一时期学术界对《水浒传》的思想内容的理解，是“农民起义”说占主导地位。游国恩等人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是这样介绍《水浒传》的思想内容的：

《水浒传》通过生动的艺术描写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整个过程，它深刻挖掘掘了起义的社会根源，成功地塑造了起义英雄的群象，并通过他们不同的反抗道路展现了起义如何由零散的复仇武圣发展到燎原大火的斗争过程，也具体揭示了起义失败内在的原因。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说

《水浒传》是一部反映封建社会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小说。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毛主席曾经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淝阳、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95页）这么频繁而重要的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在我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象《水浒传》一样大规模地反映出来。

这两种《文学史》的评价是有代表性的。从这两段引文中，我们可以大概地了解当时学术界一边倒赞同“农民起义”说的情况。这种看法对《水浒传》的评价很高，但是并不完全符合这部文学作品的实际情况。这一派学人把研究的重心不适当地移向梁山好汉“造反”的内容上，滥用马克思、毛泽东等人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把梁山的造反行动说成是最典型的中国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阶级斗争，反映了最伟大的农民革命。他们有意回避小说中确实存在的“忠义”思想和“招安”情节，如果实在回避不了，也只是一笔带过，不作深究。看起来，这似乎是对祖国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和尊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古典文学的丰硕成果，而实际上，这反映了学术界研究方法的弊端，违反了马克

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当然，这种局面的形成，其直接原因在干当时“左”的政治气候和一场接一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大风之下，百草必披，一代学人是无责任的。

公正地讲，“农民起义”说是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和雄辩力的。因为它牢牢抓住了《水浒传》中的一些情节：如英雄们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他们由分散的零星战斗发展而为大规模的闹朝廷大军的正面战争；还牢牢抓住了一些英雄人物：如常常呼喊着重“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李逵；夺御酒、殴钦差的阮氏兄弟；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武松以及历尽磨难、豪勇正直的林冲等。但是，这种观点有它致命的弱点，就是它回避了宋江的招安思想和梁山终手接受招安的行动，以及招安给梁山事业带来的覆灭的厄运。如果用“梁山泊全伙受招安”之矛，去戳“农民起义”说之盾，这块盾牌就显得太脆弱了。“文化大革命”中的“评《水浒》、批宋江”运动，正是看准了“农民起义”说的这一致命弱点而下手的：你们不是讲《水浒传》是歌颂农民起义的吗？为什么以宋江为首的一群人又招安投降了，并且充当统治者的帮凶，去镇压不肯投降的方腊起义呢？这就是“文革”期间十分走红的“投降”说。

“文革”中对于《水浒传》的评价，是以毛泽东同志的一次讲话为基调的。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③而且还把鲁迅关于《水浒传》的论述也搬了出来：“一部《水浒》，说得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④这样一些论述也是符合《水浒传》的故事情节的，其中关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和“宋江投降”以及

“打方腊”等问题，在《水浒传》里确实是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地写着。拿这些问题去驳诘“农民起义”说，即使不考虑“文革”的政治压力因素，他们也是很难为自己辩解的。持“投降”说的这一群人，如果是以学人的立场进行学术研究的话，未尝不可以独树一帜，成一家之言，同其它学人一起平等地参加“争鸣”。可惜他们是怀着丑恶的政治目的，以“评《水浒》”为名来搞政治运动，与学术研究毫不相干。在我国的学术史上，当然没有他们的位置。只是他们的胡作非为倒成了学术史上的笑谈。应该说明的是，“投降”说在“文革”前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被当时十分走红的“农民起义”说压得抬不起头来，往往不被学术界所重视。但是他们是以严肃的态度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他们研究《水浒传》的成果同“文革”中所谓“投降”说有着本质的区别，是值得在我国的学术史上写上一笔的。

“文革”以后，我国人民的社会政治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学术事业也开始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水浒传》的研究工作才真正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导下蓬勃开展起来。在这一时期，“忠义”说开始受到学术界的注意。“忠义”说认为《水浒传》的主要思想内容是忠义思想，梁山一百〇八人反抗官府斗争和后来他们同朝廷对抗的大规模的战争行为，都没有超出“反贪官”的范围；他们没有反皇帝、夺取政权的政治纲领和军事目的，他们打击贪官污吏、劫富济贫只是为了“替天行道”，是忠于皇帝的表现；宋江鼓吹招安和后来梁山接受招安并积极帮助朝廷镇压方腊起义，都是在忠义思想的支配下必然要发生的行动；宋江被害和梁山的覆灭，是忠义思想支配下必然要产生的悲剧性结局。“忠义”说还认为，《水浒传》的这种忠义思想并不是什么落后的，或者反动的东西，它的产生、形成和存在下来，是有其受到历史规律支配的内在法则可循的。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这一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